

●主持人语

春回地暖，倏忽间已是早春二月。本期“名编写名家”我邀请了我的好友——出版名家、上海人民出版社原社长王为松写他的作者刘统。刘统这几年写一本红一本，他的《战上海》和《火种》都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，因此沪人社这几年的主题读物也是红红火火、高举高打。图书走红，表面上红的是作者，背后则是作者与编者携手的温情故事。令人悲痛的是，刘统不久前离世，传奇作者的故事不再续写，而王为松社长也在前年离开了出版社，到上海市社科联任党组书记，重开新领域。我理解为松此时写此文的心情。

认识龚爱萍纯属偶然。2018年秋天，四川省委宣传部邀请我到成都作讲座。我那天比较亢奋，状态奇好，离开台上座位在观众中穿梭演讲。这本质上反映了我无知却好为人师的“大患”，但一批社长不以为患，反以为“奇”，于是我领受“错爱”，变本加厉。会后大家加我微信，龚社长发给我她拍的我“疯狂”的好为人师的“丑态”，并说“50来岁的人了还有如此激情不容易”。此后我留意她的微信，发现她的生活与编辑色香味俱全，五彩缤纷、生机盎然，很合我意。可是，看到她1月26日发出“看完《复活》，现在才反应过来，我下半辈子都是假期了”的微信后，惜叹她的退休，便立即向她组稿。她答应，我若惊。

陈文瑛是我的部下，是第一批“凤凰名编辑工作室”的主人。两年前我听过她讲转行做编辑的往事，觉得很神奇。自己人，因版面限制，在此不细表，因为她答应继续为我写，以后再表。

——徐海



我认识刘统是许仲毅介绍。我那时还在上海书店出版社，仲毅是人民社历史中心主任。有一年上海书展，我陪沈昌文、陈子善、贺圣遂、俞晓群、陆灏等人在杏花楼吃饭，仲毅请刘统、程兆奇、姚大力等人也在杏花楼，他事先叮嘱我，届时你一定要到我们这桌来认识一下大家。就这样算是认识了，后来就没有再联系过，我知道仲毅一直在争取刘统的《大审判》等书稿。

过了几年，人民社的同事齐书深和楼岚岚拿到了刘统、金立昕、袁德金等人的“决战”丛书的版权，一套六本的丛书里刘统一人写了三本，《东北解放战争》《华东解放战争》和《中原西南解放战争》。经过认真的编辑和必需的送审等程序之后，2017年建军90周年之际，全套书在八月上海书展上举行了隆重的发布仪式。书展之后，我请刘统到社里来，一是当面表示感谢，二是想看看有没有可能继续合作。

我也知道他很忙，头头的国家重大项目也在节骨眼上，自己想写的题材也不少，而且盯着他的出版社编辑也不少。所以我提出在不费他更多时间与精力的前提下，把作为丛书的《东北解放战争》和《华东解放战争》再拆分成单行本，譬如从《东北》中可以选出六七章，就叫《围长春》，《华东》也可以选出一本10来万字的《战上海》，事半功倍。我的重点自然是在《战上海》，因为再过两年，2019年就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，也是上海解放70周年。

刘统一听，就说，读者买回去一看还是老书不得骂我。新写一本关于上海的，不可以，但时间太紧，真没工夫写。

我说，还有两年时间，你材料就用《华东解放战争》里的，换个角度，写10万字就够。他说，你让我回去想想。

后来知道，他回去并不是去想想，而是去找找。看能否再写一本新书。

大约过了一个多月，他和楼岚岚来找我，说材料足够新写一本关于上海解放的书稿，跟《华东解放战争》完全不同，但是

需要时间。

我说，你现在就开始写，我们编辑团队全力配合，包括查核资料，但是2018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纪念日必须交稿。

刘统平时话不多，不像演讲时滔滔不绝，但透着斩钉截铁：这不可能，时间太紧，你们查资料也没用，这活要干还得我自己干，别人帮不了忙。

我说，这书要出就必须2019年5月出，最好是1月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就出了。重大题材需要送审的话，至少要有三五个月的提前量，所以最晚也是2018年6月底要交稿。

刘统说，我上你们圈套了。

我只能说，我们一定全力以赴，尽己所能。

这时候，我心里也没底，不知道将来书做出来是个什么样子。但有一条是我们必须也可以做到的，就是像刘统一样认真地对待这项工作。

跟他说定后，我们就立马开始申报选题，同时申报2018年度的主题出版重点选题。我跟编辑说，真要想把刘统的新书出好，就必须先把他已经出版的书都读一遍，像《北上》《跨海之战》《中国的1948年》等等，但凡能买到的都要买来读，再从编辑的角度，写一份选题策划报告，讲清楚我们为什么要赶在2019年初出这样一本书，我们为什么认为刘统是这样一本书最合适的选择，我们希望作者写成一本什么样的书，我们将如何来宣传推广这本书。为了把问题讲清楚，选题报告必须写满一万字。

刘统得知后说，你这不是把人给逼疯了吗。

我说，不疯魔，不成活。不过你放心，人民社的编辑不是单打独斗，我们是团队作战，是敢打硬仗、能打胜仗的队伍。

2019年1月，《战上海》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亮相，同时我们联合《中华读书报》在北京召开专家座谈会。有专家看了书后说，这本书为2019年的主题出版开了个好头。《中华读书报》以此为标题发了头版。

出版后取得的宣传效果，与我们当初在做选题策划时的构想是吻合的。我们和刘统达成的共识就是，我们要做的不仅是讲述上海解放的历史细节，更是要为70年前用积极作为和无畏担当赢得人民拥护的共产党人画像，为70年来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史立传，为70年后我们再以战上海精神激发起成为新时代改革开

放排头兵、创新发展先行者的蓬勃之力明德。后来在申报“五个一工程”奖时，我们群策群力提炼总结了三句话：通过《战上海》这本书，充分展现从“战上海”到“建上海”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，充分反映从“旧世界”到“新世界”翻天覆地的时代巨变，努力塑造从“武安邦”到“文治国”的共产党人群像，从而更加凝聚起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砥砺奋进的民族品格。

此后，编辑团队在76天里策划组织了51场“边走边讲上海解放70周年实景对话”活动。沿着解放军战上海的足迹，从交大工程馆到华政交谊楼，从苏州河邮政大楼到宝山月浦解放纪念馆，从高校到企业，从机关到社区，从电视到广播，从纸媒到网络，从课堂到街头，从画展到杂技，各种形式，各种形态，各种渠道，全媒体全方位全覆盖。

从1月初到5月底，有关刘统和《战上海》的各种宣传就没停过，有朋友在我微信下留言说，陈毅战上海就一个月，你们已经战了半年了。刘统说，你们这是把我逼疯了。

这一年里，当年的电影《战上海》被有心人翻找出来，一句激动人心的“向大上海前进”唤起我们这代人的童年记忆。《战上海》同名杂技剧一经亮相就备受社会各方关注。上海电视台也提出希望联合出品电视连续剧，这就是今年在央视一套和东方卫视等持续热播的根据刘统《战上海》改编的《破晓东方》。

2019年上海书展过后，我说，我们不能再合作一把。刘统知道我的意思，将了我一军：我有部稿子，就看你能不能出。他回去就把书稿发给我。

我们约了在上海书城对面的东莱饭馆吃山东饺子。

我提出，删去一半章节，聚焦主题，你再另写一半。

刘统说，那这本还是完整保留作为遗著吧。我另外写一本。

我说，老规矩，给你九个月时间写作，2020年6月底交稿，年底出书，打响2021年庆祝建党百年的“第一枪”。

刘统只说，我试试。

他去写，我们帮着一起想书名，既要涵盖全书的内容，又要叫得响，既要有学术气，又要朗朗上口，既要反映百年建党的时代巨变，又要体现早期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苦难辉煌，既要全局观，又要突出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的独特性。

一天，刘统兴冲冲来了，说，书名有了，就叫《火种》。

(作者系上海市社科联党组书记)

出版的一万零一种可能

——《寻绣记》出版记

□龚爱萍



在小镇上相遇，两个不同境况的人因绣片而结缘，从此开始长达十年的轨迹交会。一个是出售绣片换取生活，一个是寻找绣片发现了不一样的世界。当作者得知凤香的死讯，赶到凤香的家中，重返当年寻找绣片的故事现场，和死者的丈夫有一番饶有趣味的对话，让本是悲剧意味的情节充满了戏谑和更深的况味……

“写下来，就以‘凤香’为题写下来！写下来我们就可以出版了。”我兴奋得居然当场许诺，这很不像我的风格。

这个作者有丰富的且普通人没有的生活经历，不仅能说会道，而且还特能写。我直觉

她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作家，但是我忽略了她另外的身份——她是收藏家、服装设计师、

服装品牌工作室主理人，是个十足的大忙人。我等她这篇稿件整整等了三个月，三天

两头地催。她真正动笔写这篇文章，也就三

五天的时间。后来，《凤香》真的成了《寻绣记》里的主打篇章，让很多读者欲罢不能。

文字稿件催齐了，通读一遍，觉得超出了

我的预期。她的文字异于一般的作家，可

以说一出手就有一种独特的风格。内容以作者

亲历的角度，寻找散落在民间的古老绣片。

遇到形形色色的人，接触有别于我们日常生

活的另一种生活样貌，这本身就是乘着故事

去寻找故事。都市与乡野邂逅，时尚与传统

重逢，咫尺与辽远相遇……这里有反差极大的

眩目，有落差极高的惊悚。

是的，这本书应该从视觉上一眼就传达出

这种感觉：这是为设计者做的设计，设计本

身必须是惊艳的、非同寻常的。做一本美美的

书，光有文字是远远不够的，书籍审美的时

代来了。

从设计师到生产线

慢慢地，我把思路聚焦到了那些绣片上。绣片与纸张有相同的特质：它们都由纤维组成，具有某种可塑的女性特质；它们都是某种文化符号的载体。如何把这一想法付诸行动？我想到了合作多年的书籍设计师许天琪。我邀许天琪去了作者在成都的工作室，他们热情地把我送到了机场。

曾经看过余华的一个视频，讲他们四个作家参加文学论坛，以“我为什么写作”为题发言。余华说是因为“不愿意做牙医”“想睡觉”“想不上班写小说，稿费还归自己”。莫言说“想给自己弄一双皮鞋”。王朔也说了类似的故事。苏童原本准备的发言稿“很正经”，从自己上大学的经历讲到如何因为热爱而走上了文学道路，但他听了前面三个人的发言，死活也不愿意念自己准备的稿子了，因为他觉得自己那样说“很丢脸”，也应该像余华他们那样“瞎编一个”——其实余华说自己从牙医转行当作家的经历全是真的，只是别人听着像段子。

曾经看过余华的一个视频，讲他们四个作家参加文学论坛，以“我为什么写作”为题发言。余华说是因为“不愿意做牙医”“想睡觉”“想不上班写小说，稿费还归自己”。莫言说“想给自己弄一双皮鞋”。王朔也说了类似的故事。苏童原本准备的发言稿“很正经”，从自己上大学的经历讲到如何因为热爱而走上了文学道路，但他听了前面三个人的发言，死活也不愿意念自己准备的稿子了，因为他觉得自己那样说“很丢脸”，也应该像余华他们那样“瞎编一个”——其实余华说自己从牙医转行当作家的经历全是真的，只是别人听着像段子。

我当编辑已经整整30年了——干这一行年头多了，免不了

会被问到“为什么会当编辑”“怎么当上编辑的”之类的问题。我也挺认真地想过，老实说，也确实说不上什么“高大上”的理由，我当上编辑的那些事，也特别像段子。

跟余华一样，我也是转行来的，但我转了两次。

研究生毕业前一年，我特别紧张忙碌，不仅要写毕业论文，还要给本科生上公共课，而且也要考虑毕业后的去向。父亲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，他早就给我规划好了未来：读师范、当老师、回到他身边安安稳稳过日子。那时我内心十分抗拒对我命运的安排，但又不想伤他的心，只能软抗。我先是填报高考志愿时故意没填他要求的历史系而是填了中文系，大学毕业也没有如他所愿乖乖回老家的中学教书，而是选择了读研。我一心想要摆脱家里的束缚，至于摆脱后具体要做什么，也没有明确的想法。

谁知到了秋天，发生了一件事。

那个学期，我们要外出访学。我原本的计划是和几位同学一起走，先坐火车到成都，再从成都到重庆，然后乘船顺流而下，经武汉、南京到上海，从上海返回西安。但是计划没赶上变化，我出发时耽搁了一天，没跟上大部队，只好独自踏上访学之路。

在南京上岸那天已近黄昏，我从码头出来，乘公交车到山西路附近找了家旅馆住下，吃晚饭的时候，在书报摊上

买了一份当天的《扬子晚报》，报纸上有篇关于江苏古籍出版社高纪言社长的报道，占了大约半个版面。

读了这篇报道，我发现在学校里每期必读的《古典文

学知识》杂志竟然是这位高社长出版的。说来真是凑巧，这次出门，我还专门从图书馆借了一本《古典文

学知识》带在路上读。我当即决定第二天要去拜访一下高社长，不为别的，纯粹是想当面表达一下一个读者对出版者的崇敬之情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便带着报纸来到位于玄武门的江苏古籍出版社。高社长特别和蔼可亲地接待了我，

那天聊了什么，我已经不记得了，只记得最后他随口问我：“您不愿意毕业以后到出版社来工作？”我懵懵懂懂地问：“我可以吗？”他怎么回答的我也不记得了。那时候的大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，师范生一般会被分配到学校里当老师，很少有干其他行业的。那时我对出版社工作也没什么概念。

拜访了高社长后，我完成了后面的行程回到学

校。寒假过后，就是论文答辩和毕业前的各种事情。

导师建议我毕业后先找个高校当老师，同时再读个

博士学位，然后回母校跟着他做研究。到了1993年

的春天，我已经落实好了毕业去向。谁知三月份的一

天下午，学校突然通知我去领取录取通知书。我疑惑地来到系里，把录取通知书仔细看了几遍，竟然是江苏古

籍出版社发来的！

『转行』做编辑

□陈文瑛



此后，我当上了江苏古籍出版社文学室的编辑。一进社我就跟着白发苍苍的编辑前辈编《冯梦龙全集》《元全文》《近代词钞》……同时还编上了我喜欢的《古典文学知识》。我适应很快，对于那种人家感到厌烦的千篇一律的工作状态，我竟然特别满足，就像一个老农满足于自己家门口有块地可以种各种蔬菜那样，甚至在心底做好了就這樣干到退休的准备。我每天乐此不疲地在我的一亩三分地上耕耘，甚至接到了《古典文学知识》画册的工作，并且画得不亦乐乎。然天总是不遂人愿，就在我全心全意在古籍社当编辑的第十个年头，我又不得不“转行”了。

2003年上半年，江苏古籍出版社被整编了。当时的情况是，绝大部分人员要被分流，“江苏古籍出版社”这个名字将成为历史。即将被分流的人，像菜场打烊前卖剩下的蔬菜一样，被搭配起来打成大小小的包，由接收单位抓阄决定去向。有四五个编辑加两三个行政人员的“大包”，也有三四个编辑加两个行政人员的“中包”，还有两个编辑加一个行政人员的“小包”。我就这样被打进了一个“小包”里，最终被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“抓”走了。

对这次转行，我心里非常失落，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都是处于沮丧状态的，感觉命运把我弃之道旁了，前十年的努力全部归于零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。

为适应新岗位，我像刚被移植的绿植，努力适应环境，寻找适宜的生长空间。然而对于少儿出版，我几乎无从下手。就在这时，我8岁的儿子“拯救”了我。

儿子特别爱读书，还喜欢跟人讨论。我给他买了很少儿图书，也会经常带他去书店和图书馆。那时的他，每天放学后最开心的事，就是在我们过道的书堆里翻书，偶尔还会扒出几本纸张发黄、甚至已经绝版的少儿图书。平时我们俩一起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津津有味地读这些书，对它评头论足，有时还会为了书中的某个细节争得不可开交。慢慢地，我好像找到了对少儿图书的感觉。就这样过了大半年，忽然有一天，儿子写的一篇作文被老师表扬了，他写的是《我的妈妈》，我拿过他的作文本一看，有一句话下面画着红色波浪线：“我的妈妈是个工作狂。晚上我睡觉了，她在灯下看稿子，早上我睡醒了，她还在灯下看稿子……”老师问我他写的是不是真的，我想告诉她是真的，但我没说。

曾经的失落和沮丧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淡去，一片新的蓝海在我眼前徐徐展现，我再一次成功“转行”。我的两次“转行”，看似偶然，其实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变革有着必然的联系。命运的安排也许无法预料，但我相信，无论处于何种境地，只要努力